

田志勇／解读

英雄辈出 内涵丰富

全新解读 启迪深思

三国志

名篇解读

华文出版社

田志勇／解读

三国志

名篇解读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志名篇解读/田志勇解读.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 11

ISBN 7 - 5075 - 1564 - 8

I. 三... II. 田... III. ①中国—古代史—三国
时代—纪传体②三国志—研究 IV. K236. 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75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b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66035914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三河市东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32 开本 12.625 印张 26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 - 10000 册

定价: 22.50 元

前 言

《三国志》是公认的一部良史，西晋陈寿撰。这部史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创新。内容上，它是以人为主叙事的纪传史，只有纪传，没有表志，这有陈寿的创作用意，突出人的作用，揭示三国鼎立是人谋规划而形成的历史。全书内容十之七八，即人物传记的十之七八，写的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即公元190年关东起兵讨董卓到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这三十年战乱的历史。从王朝体系来看，这一段历史恰好是季汉献帝时期，而陈寿把它作为三国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历史眼光已不同凡响。陈寿品评人物作纵横比较，如说诸葛亮，是良平之亚，把他与西汉开国功臣张良、陈平相比较。品评刘备与曹操作比较。品评庞统、法正与魏臣荀彧、程昱、郭嘉作比较。在人物排列上，先谋臣后武将。这些都体现了陈寿对各色人物影响历史的看法，旨在揭示“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辩证历史观。所以《三国志》尽管用笔简练，人物传记大都短小，但写得生龙活虎，三国英雄藉此以重名，警世意义深入人心，这是其他纪传史难以企及的成

就。《三国演义》如此精彩，因为《三国志》奠定了基础。

从编纂形式看，《三国志》是一部断代纪传国别史，这也是一种创新。三国鼎立，各自发号施令，各有正朔，实质是列国纷争，故以《三国志》名之，这是实录精神的生动体现。吴蜀二主，名为列传，实为编年记事之纪，但不以纪名，独立标出魏帝为纪，又弥合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正统观念，而汉、魏、晋的承传，也符合历史演进的实际，也是实录精神。这些既是陈寿的创造，也是陈寿继承太史公笔法，仿《史记·六国年表》之立意而发扬光大，既做到了实录，又不违背古代当时人的礼义观念。《三国志》号称良史，当之无愧。

本书选《三国志》主要人物纪传共二十七篇，按魏、蜀、吴原书序列分为三组。曹魏人物十一篇，蜀汉人物十篇，孙吴人物六篇。三国中蜀汉最为弱小，立国最短，其影响历史之作用逊于魏吴。但刘备最为悲剧英雄，蜀汉君臣创业最为艰难，他们的得失教训更多警世意义，所以入选人物也较多。这也许就是《三国演义》用笔最多的原因吧。所选人物集中在三国时代前期，用以反映“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主题，说明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个别人物传做了节选，为了使行文整洁，没有一一加删节号，特此说明。

本书选目原则已如上述，注讲体例有四个层次，由“题解”、“段意”、“简注”、“讲析”四个部分合成解读，此外，篇前有序论，宏观概述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为解读之纲。注讲的四个部分，都要反映新见解，吸收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行文则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1. 题解。题解包括四个基本项：一、释篇题；二、介绍传主；三、提示篇旨；四、述作者意向。传主写入题解，在“简注”中就不立条目。

2. 段意。段意是对结构段内容的高度概括，具有点题、剖

析、归纳的作用。段意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而不是选文的分段复述。

3. 简注。简注内容为难字注音、解词，串译词句，释人名、地名、职官、掌故等。简注要求通俗，扣紧行文，一般不做引证，歧说只注一说。地名注释，凡行政区只注治所在今的准确方位，一律不注辖区范围和沿革。各篇选文独立为主，重出条目不注参见，或有详略，依随行文，以便读者。

4. 讲析。讲析内容扣紧传文，分析评价其思想内容、历史内容、人物事功，以及艺术内容、传文史料价值等。“讲析”要求具有较高的学术性，要求有新见解，而行文要通俗，力避写成读书札记或考证文章。“讲析”不进行百家争鸣，而只是扣紧传文做具体分析。

最后说一下撰写本书的缘起。

孩提时候听老人们讲曹操、刘备、孙权和诸葛亮、关、张、赵云的故事，知道了有一本讲历史的故事书叫《三国演义》。后来上了大学，又知道了陈寿和他的《三国志》。读了《三国志》，才知道《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人物并非虚构，但也总算知道了历史人物传记与历史人物演义终究是大有不同之处。又过了几年，当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时，与给我们上课的一位青年教师邓瑞全先生过从较多，他指导我阅读《三国志》，于是三分故事也成为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邓先生长于文献考据。我们在讨论中，知道了诸葛亮草船借箭的神机妙算，原来有张冠李戴的投影，孙权探营受箭的故事被罗贯中移甲作乙了。还有，在京剧中扮白脸的曹孟德，通过对《三国志·武帝纪》的学习，认识到他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性人物，于是油然而产生了搞一点研究的想法。但本书得以写成，首先要感谢张大可教授的无私帮助！我有幸得识张先生，是在2002年春重庆首届中国《史记》研究会年会上。我早已拜读过张先生的《史记全本新注》、《史记论赞辑释》和《三国

史研究》、《三国史》等诸多大作，心存景仰，于是通过亦师亦友的邓瑞全先生的引荐，拜会了张先生。张先生为人的谦和和学识的渊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张先生得知我对三国史有较浓厚兴趣并尝试着对《三国志》有关人物的传记进行解读时，不仅对我的粗浅见解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且热情地鼓励我完成想要做的工作。我们在开会间隙展开了解读篇目的讨论。我接受了张先生的建议，集中解读三国鼎立何以形成为主题，重点选了三国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传记，也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用力最勤的篇章，毫无疑问也是《三国志》中的名篇，于是书名就定为《三国志名篇解读》。由于我远在云南边陲，研究《三国志》的资料收集工作较为困难。张先生又慷慨地给我提供相关的资料，并将他多年研究《三国志》的心得提供给我参考。本书的初稿完成后，张先生放下自己的写作，悉心审阅书稿，纠正了书稿中不少的史实错误，并赐长篇序论。我有幸得到前辈学者这样的焚掖与提携，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此外，我还要感谢我所在学院的领导对本书出版的支持。本书在华文出版社的支持下得以面世，责任编辑杜海泓付出了辛劳，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例如《文帝纪》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收入的。对所有支持本书出版的师友、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田志勇

2003年12月9日凌晨
于红河学院西院寓所

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代序)

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

三国鼎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的历史课题。不仅三分故事自宋代以来由于平话、戏剧、小说的影响，已是家喻户晓，而且形成三分的历史发展，威武雄壮，可供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但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这一课题的研究，似乎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目前史学界已成定论的观点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其理由是：“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①。”这就是三国鼎立的“必然性”理论，可名之曰“经济均衡论”。史学界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论著和各种教科书，对三国鼎立的看法都没有越出“经济均衡论”的樊篱。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江流域已有巴、蜀、楚、吴、越等国家的建立，何待于两汉以来的江南开发形成经济均衡！割据长江上流的刘璋、刘

^① 葛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2册第5页。

表，甲兵资实，不弱于孙吴，更不减于刘备，何以要待刘备来建立蜀汉形成曹、孙、刘三家对峙！可见“经济均衡论”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发展的整个长河来看，王朝兴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南北对峙都一再出现，而三国鼎立是惟一的一次历史存在，可见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是一个特例。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就像生物遗传工程上的变异一样，有它变异的特殊原因，而不能用“常规”的必然性理论去解释。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封建王朝，最长的莫过于两汉、盛唐、朱明、清朝，这几个朝代都没有超出三百年。短命的王朝如秦朝、新莽、隋朝只有十几年或几十年。每一个封建王朝解体，都要出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而后走向统一，形成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性运动^①。这可以看做是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运动。因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即使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下，“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②，中央集权力量一旦削弱或解体，就要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割据混战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它是不能持久的。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这是历史的趋向。群雄割据中的优胜者，顺应历史的趋向，他就能削平战乱，统一中国。秦、两汉、隋、元、明等封建王朝末年的战乱，很快走向了统一，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常规。南北对峙就打破了这一常规。中国历史上有东晋与北方十六国之对峙，有南北朝之对峙，有北宋与辽之对峙，有南

①《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不能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观点，而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朝代兴亡分合的总概括，而发展方向是走向统一与巩固，故引作“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②《毛泽东选集》横排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卷第587页。

宋与金之对峙，这些对峙历史都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而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均衡论”加以解释，更何况三国鼎立。

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迫使政治腐败的汉人政权退到南方，依恃长江天堑作为屏障而偏安江南。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一再重演，所以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一再出现。东晋与南宋两个时期的南北对峙，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而人心向背也有利于南方，因此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岳飞抗金都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是由于南方政权的政治腐败而使北伐总是归于失败。显然“经济均衡论”在这里是无法解释的。东汉末年没有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而是军阀混战演成了三分，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因而形成了一个历史发展的特例。

“经济是基础”，任何时候这都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东汉末年的战乱，北方经济残破，没有力量支持曹操不停顿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确是三国鼎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曹操南下荆州，接着又东进赤壁，连续大规模作战，北方经济无法承受。吴国的朱治就说：“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①。”周瑜论曹操必败，原因之一是“又今盛寒，马无藁草”^②，也说明了北方后勤供应不继，士卒乏衣粮，马乏草料，乃是一种冒进。但是，当时曹操已得天下十之七八，长江上流的益州牧刘璋遣使请降，只有区区江东六郡相抗，且孙权内部未靖，山越未服，南北对抗众寡悬殊，并未形成均衡。只要曹操计划周密，时机得宜，不冒进赤壁，完全有统一中国的可

①《三国志·朱治传》裴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周瑜传》。

能。赤壁战后，荆吴之势强，刘备入蜀，三国鼎立形成，才出现了南北的经济均衡，对于“三分对峙”，有一定的影响，但仍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曹魏的实力，仍大大强于吴蜀二国力量之和。尤其是蜀国这个弱小政权，远不敌曹魏，而诸葛亮居然能够屡次北伐。蜀国所恃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吴蜀两国的互为犄角之援。经过几十年的对峙，北方经济恢复，吴蜀两国政治昏暗，人心反向，曹魏和西晋的人力、物力占了压倒的优势，三国也就归于一统了。经济的因素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反证，三国鼎立决定于南北的经济均衡。

三国鼎立有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才形成的。如果我们划分一下三国鼎立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可明显地看出来。不过划分三国历史的发展断限，十分复杂，难以用一个标准来统一，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分段标准，都可成立。排定历史编年，可以按王朝体系划分历史断限，三国鼎立始于公元220年的曹丕称帝，迄于公元265年的西晋建立，前后四十六年。在西晋建立之前两年，蜀汉已亡，历史进入了晋吴两国的南北对峙。但作为一个有始有终，因果相连的历史时期，三国纷乱的历史，应起于公元190年的军阀混战，迄于公元280年的西晋灭吴，前后九十一年。研究三国历史，不追溯东汉末的军阀混战，就不能说明三分的由来和三国史事的因果；不讲西晋灭吴，就没有结尾。这九十一年纷争历史可以从两种角度来划分三国历史发展的断限。从三方对峙国别史的角度来叙述，可划分为三国形成时期、三国发展时期、三国走向统一时期三个阶段。从公元190年到220年是形成时期；从公元220年到239年魏明帝之死为三国发展时期；从240年到280年是三国衰落走向统一时期。这样划分是着重讲三国形成后的历史发展，而把三国的形成只是作为一个引子。但是我们如果侧重于三国鼎立为什么会产

生，则应着重讲三国形成时期的历史，三国对峙历史不是主要的叙述对象，这样发展断限的划分就会迥然不同。陈寿的“三国志”则是侧重于三国形成时期的历史叙述，即详于乱而略于治，或者说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本文着重探讨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从这一角度可将九十一年三国历史划分为群雄割据、三国鼎立形成、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三个阶段。公元190至207年是东汉末群雄割据阶段，前后十八年，从人才均势上形成了曹孙刘三个集团。公元208年赤壁之战至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是三国鼎立形成阶段，前后二十三年，三方斗争交错，内容复杂，形势发展瞬息万变，最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三国鼎立才得以确立。公元230年至公元280年，是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前后五十一年。半个世纪的“三分对峙”，地理均势起了主要作用，南北的经济均衡作为地理均势的补充也起了重要作用。研究三国鼎立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第一二两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可以鲜明地看出，“形成三分”实非某种单一的历史原因所决定，也并非必然要出现的局面，而是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通过无数的偶然事变，交互作用的结果。当然，历史的偶然又存在于必然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这种存在于必然之中的偶然是怎样引导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将复杂的历史内容规范在简单化的必然性公式模式中。

所谓“必然”，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客观的历史条件。东汉末年豪强地主集团的经济膨胀有很大的割据性，必然带来军阀割据混战；反过来，割据兼并必然导致统一，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向。南北的经济均衡和吴蜀两国所依恃的地形险阻，是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谓“偶然”，是指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由于三分的人才均

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等多种历史原因的交叉才形成的。三分的人才均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都是“偶然”的事变。这些历史事变是“人谋”起了主导的作用。下面分层次论述三国鼎立形成的多因素历史原因，并着重分析“人谋”的历史作用，以供讨论。

二、东汉末军阀混战所形成的 三分人才均势

三分的奠定，首先是在军阀混战中，使汉末人才分散，形成了曹孙刘三个坚强的领导集团。

汉末军阀，穷凶极恶的董卓，顽悍乐杀的公孙瓒，贪利赖宠的陶谦，倏彼倏此而横的吕布，狂愚而逞的袁术，雍容论道的刘表，昏暗懦弱的刘璋，都无戡乱之才，他们的作用是为胜利者驱除，在群雄角逐中注定要被歼灭。志大略疏的袁绍，文武兼资的曹操，弘毅宽厚的刘备，任才尚计的孙权，都有统一天下之志，任人有方，驭才有术。而后袁绍败亡，演成了三分之局。

官渡之战奠定了北方的统一，消除了一个争天下的强手；赤壁之战曹操受挫，孙刘之势强，于是奠定了三分之势。本来这两次战役都有混一天下的可能。袁绍鹰扬河朔，雄视天下，若官渡之战袁胜曹败，袁绍君临天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曹操统一北方，“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①，若赤壁战胜，称孤道寡乃必然之势。但这两次战役都是强者败，弱者胜，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历史的天平，使偶然因素变成了必然之势。这里的“偶然”，是指曹操官渡告捷，孙刘赤壁战胜，带有

^①《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

“偶然性”；但“偶然”胜利之后，使形势逆转，成为了不可战胜的强者，这就是“必然之势”。反过来说，叱咤风云的袁绍和曹操，不听谋臣劝谏，丧失了取胜之道，只是“偶然”的一着失计，造成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必然”后果。

袁绍之败 袁绍在官渡之战以前一直是走上坡路的。他积聚了许多争天下的优势。袁绍不仅有可恃的袁氏四世五公的政治资本，而且他本人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具有雄略的气质。在政治斗争中，袁绍主谋诛灭宦官，又首倡讨董卓，大得人心。韩馥让冀州，袁绍受之，而豪杰之士多归之，数年之间，遂兼有河朔四州，天下无敌。沮授、田丰、审配、逢纪、辛评、辛毗、郭图、许攸等智士为之谋，魏义、颜良、文丑、高览、张郃等勇士为之统其军。但是官渡之战，袁绍一败涂地，从胜利的顶峰跌落下来，坠入了灭顶的深渊。袁绍官渡之败的主要原因是因胜而骄，一意孤行，以个人之智敌曹操之群士。他不纳田丰之谋，不用沮授之计，既要急于进取，而又坐失战机，不在曹操东征刘备之时进军，焉能不败？袁绍外宽内忌，能聚人而不能用人，不仅荀彧、郭嘉、董昭等智士离他而去，就是效死之士如沮授、田丰等也无所施其能。张郃、许攸则因其计不用，愤然阵前倒戈。袁绍逞个人之智，又碰上了曹操这样一个棋高一着的手，他就难逃覆败的命运了。官渡之败暴露了袁绍的弱点，他不是曹操的对手。在奉迎献帝问题上，袁绍拱手让曹，就输了一着。然而这是对全局成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着，袁绍输了，处处被动。曹操赢了这一着，全盘皆活，处处主动。袁曹二人相较，袁绍凭借的是“力”与“地利”，曹操依靠的是“智”与“道术”，两人政治素质的优劣不待分辨而高下自分。《武帝纪》中有曹操与袁绍如下的一段对话：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

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实现了他的“南据河，北阻燕、代”，也可算得上群雄中的佼佼者。但与曹操相比，袁绍只是一个“小器”。王夫之说：“起于纷乱之世而欲成大业，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业^①。”袁绍能屈韩馥、公孙瓒之辈，而不能屈曹操，故不能建非常之业。曹操高于袁绍，不只是个人的政治素质，而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袁绍看重的是地利和兵力，曹操看重的是人才和道义。所以诸葛亮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②。”十分精当。

曹操赤壁之败 曹操用兵如神，善能以少胜众，以弱克强，但在赤壁之战中却是御众而败，盛强而摧，大出人意料之外。王夫之分析说：“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这就是说，曹操也没有真正做到诚心任用智力以扶持大义，而是为一己之私利用权术驾驭人才。谋士的意见，投合自己的私心就采纳，不投合自己的私心就不采纳。曹操的赤壁之败，正是如此。他不听贾诩、程昱的善计而急于东进，重蹈了袁绍拒谏的覆辙，走上了恃众欺寡，恃强凌弱的失败之路。曹操之急于东进，也正如袁绍之急于南下一样，是急于做皇帝梦，故冒行以建非常之功，结果是志骄意得，欲速而不达，被孙刘联军的智力所击败。赤壁之战是一场斗智斗力的群英会。

①《读通鉴论》卷九。下引王夫之语均出此篇，不再注。

②《三国志·诸葛亮传》。下引诸葛亮语出此篇者不再注。

孙刘两家的谋臣武将，齐心合力共御曹操，而曹操却颐指气使，以一人刚愎自用之智，抗天下群英之会，败亡也就是必然的。

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奠定三国鼎立的重要战役。前者袁绍失败；后者曹操失败，使统一的局势一再受挫，而演成三分之局。这两次弱者挫败强敌的战役，都是“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赤壁之战，刘孙联合的基础就是以人才三分的均势为前提的。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就是“人谋”在规划三分。尽管刘备败逃，无存身之地，但“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①，所以孙权就对诸葛亮说：“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②。诸葛亮出使江东是以鼎足之形为条件与孙权进行谈判的。他对孙权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为何人才三分，这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是一系列偶然事变的分合所形成的必然之势。前已述及，荀彧、郭嘉、董昭，初投袁绍，后归曹操。鲁肃与刘晔友善，最初欲依巢湖郑宝，而后两人分道扬镳。诸葛瑾、诸葛亮，同胞兄弟，一个辅孙权，一个佐刘备。在乱世之中，局世未明朗之时，际遇交合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但是人往高处走，天下扰攘，君择臣，臣亦择君，又是必然之势。东汉末年的人才形成三分而未若江河之归大海，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试分析如下：

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汉朝还没有完全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刘姓皇帝仍是一面旗帜。两汉儒学昌盛，它所宣传的君权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士大夫多尚气节。袁绍在反对董卓废立时就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

①《三国志·程昱传》所载曹操谋士程昱语。

②孙权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宜闻天下，公欲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①。”二是东汉世家大族正处于上升时期，多名节之士。尤其是两次党锢之祸，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政，赢得了天下人的归心。这两个客观因素对曹操有得有失。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四方人才多归往之，这是得。但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庶族，初起时不敌袁绍，不仅使得一部分北方士人流归了袁绍，如沮授、田丰、审配等，而且延迟了他统一北方的时日，眼看孙权坐大、刘备寄居荆州而不能及早消灭，这是失。关东军讨董卓，孙坚力战第一，义动天下，也赢得了一部分人才的归心。张昭、周瑜、程普、黄盖等倾心辅佐孙氏兄弟，这是孙吴之得，反之则是曹操之失。刘备以帝室之胄，“受左将军之命，躬膺天子之宠任，而又承密诏以首事，先主于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天下以兴师”^②，露布衣带诏讨曹，使曹操蒙受“托名汉相，其实汉贼”^③的恶名，而刘备则以正统自居，诸葛亮辅刘备，不仅仅是报三顾之恩，而且也是扶持正统。这是刘备之得，亦是曹操之失。

主观原因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曹操的对手刘备、孙权都是人中之杰，总揽英雄有很大的号召力。二是曹操品德不济，奸险诈伪，暴虐无比，使得一部分智士远离了他，像诸葛亮、庞统等人宁肯归隐待时，也决不北投曹操。陈宫、张邈之叛，就是鄙薄曹操的为人。曹操傲慢，把蜀中使者张松推给了刘备，这是最大之失。东晋史家习凿齿评论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

①《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献帝春秋》。

②王夫之语，见《读通鉴论》卷九。

③周瑜语，见《三国志·周瑜传》。